

皇帝不可爱

爱国家等于爱皇帝吗？

国事糜烂之世，各色人等如何自处？

聂作平 著

国家怎么办



中华书局



皇帝不可爱 国家怎么办

聂作平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帝不可爱,国家怎么办/聂作平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
2012.7

ISBN 978 - 7 - 101 - 08710 - 9

I. 皇… II. 聂… III. 中国历史 - 明代 - 通俗读物 IV.
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2454 号

书 名	皇帝不可爱,国家怎么办
著 者	聂作平
责任编辑	徐卫东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
印 数	1 - 8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 - 7 - 101 - 08710 - 9
定 价	22.00 元

目 录

皇帝不能承受之轻 / 1

皇帝的面子 / 9

肥胖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/ 16

除夕夜的两种叹息 / 21

一个被血统杀死的人 / 26

工资太少,我不得不贪污受贿 / 31

那些诏狱里的冤魂 / 36

基层的溃烂 / 42

敲骨吸髓的发明 / 48

乌龙会的乌龙事 / 55

潘多拉之盒是怎样打开的 / 62

小朝廷脖子上的绞索 / 67

偶像的诞生 / 72

人到底可以有多无耻 / 78

奴才何以成为第五纵队 / 82

天子门生的结局 / 88

像周延儒那样揣测圣意 / 94

讨老婆是危险的 / 100

比一比,看看我们谁更穷 / 105

替罪羊是怎样死的 / 110

抹布韩一良的清廉秀 / 116

三有干部李三才 / 121

变节者洪承畴 / 127

制度的牺牲品 / 135

出位是一桩冒险的大买卖 / 141

一个经验主义者的非正常死亡 / 147

两只虎的命运 / 155

马士英的如意算盘 / 161

礼乐崩坏时代的高官典范 / 167

平贼将军的生存法则 / 173

帅哥高杰的悲剧人生 / 179

夹缝里的小臣 / 185

小官员如何影响大帝国 / 192

大明最后一个循吏 / 197

史可法的中国式表演人格 / 203

才子是一种有毒的花 / 208

覆巢之下的丑星 / 213

风流才子的追悔 / 219

所有的理想都是为了破灭 / 224

从著名作家到疮疖良药 / 228

钱谦益的幸福指数 / 234

掉进米缸的老鼠 / 239

在意淫的感动中 / 244

后 记 / 249

大明隆庆六年，三十六岁的隆庆皇帝去世，他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继位，是为万历皇帝。在大明十余位皇帝中，万历是惟一的冲年继位者。明摆着，一个十岁的小朋友，不可能真正地治国平天下。大明的江山没有因龙椅上坐的是一个小孩而变天变色，其因在于稳定的文官制度已经深入人心。皇帝虽然只有十岁，但作为一种威权的象征，诸位顾命大臣可以假他之名号令天下。

隆庆去世时，留下的遗产除了万里江山，还有众多美丽的遗孀。其中一位遗孀姓李，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这就是万历的生母。母以子贵，万历继位后，原本只是贵妃的李氏被尊为皇太后。这个二十几岁就丧夫的女子，饱读圣贤书，一心想把她亲爱的儿子培养成大凡有志向的皇帝都意淫不止的“尧舜禹汤”——韦小宝管这叫“鸟生鱼汤”。她每天五更就把小皇帝从被窝里揪出来，胡乱洗把冷水脸后，就必须苦读诗书。有一回，小皇帝偶尔和几个太监嬉戏，不慎砍伤了一个小太监，李太后又怒又气，几乎动了要废掉小皇帝的念头。李太后不仅自己对小皇帝严加管束，还

一再给身为顾命大臣的张居正打招呼，要求张居正对万历怎么严格就怎么来。饱学而严肃的张居正果然不负李太后厚望，一心一意地按照他所理解的明君与圣君的标准来培养和要求万历。对这位既是帝国首辅，又是自己老师的老先生，万历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敬畏。有时候，当万历不肯用功读书，李太后就吓唬他：“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告诉张先生。看他怎么收拾你。”——倘若张居正和李太后知道他们苦心孤诣培养的明君，后来竟成了大明帝国衰落的病根子，恐怕会气得拍着棺材板跳起来。

张居正是典型的儒士。在儒家传统里，皇帝爱民纳谏，臣子忠心事君，天下就可以大治。也就是说，儒家认为，只要从皇帝到臣子，人人都是一无瑕疵的道德楷模，天下离大同世界便不远了。但是，皇帝英明或暗弱，大臣忠贞或奸猾，这些印象式的东西都不能用精准的数字来评估，而历代以来的所谓明君或昏君，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，不过是一些对前代帝王事迹的归纳和类比。孟子先生在两千年前认为，所谓明君，也就是能够使他的百姓“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”——丰收之年能够吃上饱饭，灾荒之年不至窜死他乡。这标准看上去很低，但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，在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，其比例不超过十分之一。更何况，皇帝也是肉身凡胎而不是神，再优秀的皇帝，和人们——尤其是那些苛刻到了吹毛求疵地步的儒士出身的官员——心目中的明君总是有着永远不能消除的差距。哪怕天纵英明如唐宗宋祖，也曾一再遭遇来自他们的臣民的批评。因此，当张居正和李太后用古已有之的明君榜样来激励万历时，在这个日渐成长发育的皇帝心中激起的，很可能是不以为然，甚至是反

感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李太后和张居正都成为过去式，长大成人的万历终于可以威福自专时，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和母亲教导的那样，去学习做一个明君。恰恰相反，他走向了明君的另一面：昏君。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坚持认为：“明亡之征兆，至万历而定。”苦命的崇祯，不过是替他的糊涂爷爷受过还账而已。

其实，万历一开始也打算做明君，他在位的前十年，任用张居正，厉行改革，意图富国强兵，以至有中兴迹象。只不过，如同昙花一现，万历的勤政很快就被怠政取代。引发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，很大程度上，仅仅出于万历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——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，很多时候，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味品，如果把调味品当成了主食，即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，同样也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。

从法律上讲，皇帝拥有包括皇后、贵妃、妃、嫔、昭仪、婕妤、才人和美人在内的几十个老婆，还不算宫中地位低下、姿色却夺人心目的众多宫女——后来继承万历“革命事业”的光宗，就是万历心血来潮时，偶然和一个姓王的宫女搞一夜情下的种。按惯例，一个想得到皇上雨露滋润的女人，一般得来自名门望族，并经过层层苛刻而古怪的选拔，才能和众多女人一起，分享皇帝的爱情。这种程式化选拔出的女子，毫无疑问，重要的不是她们是否漂亮，是否性感，而是是否端庄，是否温良恭俭让。早在朱元璋时代，这位爱唠叨的开国天子就令儒臣们按他的意思编写了一本《女诫》，一再警告他的儿孙们：“治天下者，修身为本，正家为先。正家之道，始于谨夫妇。”就是说，作为皇帝，他虽然拥有无数女人，但真正有名位的那些个皇后和妃子，皇帝

不应该对她们是否美貌，是否和自己情趣相投提出要求，要求的是所谓端庄娴静的品行和母仪天下的典范。翻翻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些皇后和贵妃们的画像，她们一个个表情严肃，五官呆板，看上去更像是研究微生物或盐化工的科学家。要想在其中找出一两个有女人味的美女，并不比在青楼里发现贞女更容易。在礼制的仪轨下，皇帝和他的女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不是爱情，也不是性，而是同样仪式化了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政治。但万历想要爱情，想要正常人的爱情，而一个姓郑的女子罕见地给予了他渴望的爱情。

这个姓郑的女子，史称郑贵妃，是河北大兴（今北京大兴）人。与其他嫔妃在皇帝面前要么战战兢兢，要么努力扮出一副严肃模样不同，以史书上寥寥可数的记载来看，郑贵妃是一个聪明而活泼的美女——聪明在成千上万的宫女中，自然不乏其人，但聪明的同时还拥有活泼，或者说敢于活泼，则寥若晨星。黄仁宇先生认为，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，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这种精神上的一致，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万历大婚时所娶者为王皇后，其时，万历只有十四岁，王皇后只有十二岁，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发育的黄毛丫头。等到万历与郑贵妃相遇时，他们一个十八岁，一个十四岁，正是情窦初开的花骨朵一样的年龄。现在这年龄拍拖，父母不免要切责：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，怎么能早恋？但几百年前的大明帝国不同，这个年龄，早就该谈婚论嫁了。这个十四岁的女子能得到十八岁的皇帝发自内心的爱，除了黄仁宇先生说的他们精神上的一致外，还有一点，那就是郑贵妃敢于在万历面前表

明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。在她眼里，万历固然是凌驾于帝国之上的天子，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温柔与抚摸的男人。当其他嫔妃在万历面前百依百顺，内心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时，郑贵妃却敢挑逗皇帝，甚至和皇帝开玩笑，用撒娇的口吻对他说：“陛下，你真是一位老太太。”这种貌似犯上的肆意之举，正好搔着了万历的痒处——身为皇帝，其实也就成了天底下最寂寞的没有朋友更没有知音的“寡人”，他既不缺权力，也不缺美色，惟独缺少真正的爱情。终其一生，万历一直对郑贵妃深爱如一，直到郑贵妃从当年的青春小女子变成臃肿老妇人。

万历和郑贵妃生育了一个儿子，这就是朱常洵。爱屋及乌，万历对这个排行老三的儿子表露出了空前的溺爱，他甚至有把朱常洵立为太子，百年之后承继大位的想法。然而，按照历代——尤其是本朝太祖定下的规矩，皇位的继承必须是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。王皇后没有生育，但万历偶然和王宫女的一夜情，却生下了他的长子，也就是朱常洛。虽然万历万分不情愿，但按规矩，他必须得立自己不喜欢的长子为继承人。在爱情与规矩之间，万历理所当然地倾向于前者。但是，规矩同样不可逾越，尤其是朝廷里那一帮大臣，自从他们看出了万历的企图后，上书要求尽早册立太子的奏章便如同雪片一般飞来。

和后人想象中皇帝是无所不能的、随心所欲的不同，皇帝其实也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——当然，不讲游戏规则的暴君除外。大凡享国较长的王朝如汉唐宋明，大体上没出过多少暴君。与其说是这几个家族的基因更优秀，毋宁说深入人心的游戏规则对君权发挥着有效的匡正作用。一般来说，皇帝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

于祖制和清议，而敢用这二者去校正皇帝行为的，就是人数众多、面目模糊的文官集团。当万历动了废长立幼之心，就好比捅了文官集团的马蜂窝。在文官们看来，皇帝此举，既不符合祖制，也有悖于清议。万历自知理亏，他始终不敢把废长立幼的想法付诸行动——哪怕口头上的公开表示也不敢，他只是一再拖延正常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时间，同时也对动辄用此事来批评自己的官员大发雷霆。到后来，当他明白自己虽然贵为天子，握有天下苍生的生杀予夺大权，却没法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最丰厚最深情的回报时，他对文官集团饱含憎恶，憎恶之下的过激之举就是消极怠工。

万历在位后期，这位曾经想做明君的皇帝越来越不理朝政，他对文官集团的批评或建议，一律置之不理。自从1585年以后，除了仅仅于1588年出城看了看自己的坟墓外，三十多年的时间，他竟然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。有人怀疑他可能染上了毒瘾，躲在深宫里吸毒。但史料更多表明，他并不吸毒，而是在躲避，在罢工。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怠工造成的恶果是无法计算的，《明史》称：万历三十年，“时两京缺尚书三，侍郎十，科道九十四，天下缺巡抚三、布按监司六十六、知府二十五。”我们平常只听说某个时代官员太多，像这种高级官职差缺如此之多的“盛况”，的确乃万历创造的人间奇迹。

此后，这种“人间奇迹”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：1610年，中央政府六个部，只有刑部才有尚书，其他五个部全没有。六部之外的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已空缺十年以上。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，囚犯们关在监狱里，有的长达二十年之久也没人问过一句

话。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，辗转在血泊中呼号。囚犯们的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外，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万历号哭哀求，连路人也跟着一起哭。但万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

大学士们一再上奏请求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，万历充耳不闻。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万历不理不睬，官员们的辞职报告，也同样置之不理。宰相李廷机年老多病，连续上了一百二十多次辞呈，万历一个字的批示也没有。最后李廷机不辞而别，万历也不追问，好像从来就没这回事。1619年，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，在萨尔浒大败，阵亡将士五万人，开原和铁岭相继失守，沈阳危在旦夕，京师为之震动。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万历批准增发援军，万历依然不睬；大臣们又转到思善门痛哭，但同样没有任何结果。这种被柏杨称为“断头政治”的万历怠工模式，一直持续到万历去世才告一段落。

万历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没能如愿作为储君，而是受封到了河南，土地多达两万顷，大概也创下了历代藩王封地的最高记录。万历三十二年，这位福王结婚时，婚礼的费用是白银三十多万两，相当于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，同时也是万历本人大婚费用的四倍多。等到后来李自成打下洛阳，扬眉吐气的义军把福王像猪一样宰了，和着鹿肉一起煮食，称为福禄（鹿）宴。

历尽三十年艰辛才登上皇位的太子朱常洛，继位仅一月便死于急性肾炎——肾炎的起因，和郑贵妃有关。当是时，早已年长色衰的郑贵妃痛失万历这个强大靠山，她怕遭到朱常洛的报复，一口气向朱常洛进献了几位绝色美女。孰料，就像久饿之后暴饮

暴食最容易吃坏肚子一样，三十多年里一直谨小慎微的朱常洛在绝色美女们的“围剿”下，很快就沉痾不起。

这个故事说明：

第一，就像上帝无法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背不动的石头一样，皇权也不是万能的。在帝国政治的博弈中，貌似强大的皇帝甚至无法满足心爱的女人的欢心。

第二，爱情是一种微毒的奢侈品，这种奢侈品过于昂贵，即便是富有四海的皇帝，也不一定有足够的实力消费。所以，对一个想要成为明君的皇帝来说，他应当做到八个字：珍爱权力，远离爱情。

甲申年春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；尔后，大军势如破竹，直逼京师。非常令人不解的是，崇祯在李自成包围京师之前，差不多等于放弃了有效抵抗，仅仅依靠士气不振的残兵败将和宫里临时拼凑的一群太监坐守孤城。——这样的部队能抵挡得住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多年的农民军吗？崇祯不会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。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他的国都共存亡，在京城陷落的前夜绝望自杀。崇祯走出如此臭棋，在于他是一个要面子的皇帝。死要面子活遭罪，这句鄙乡骂人的俗语，用在崇祯身上，再恰当不过。

崇祯最好的选择，无疑是南迁。明末农民军活动的主要省份包括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和四川等北方及中西部地区，至于长江以南的浙江、福建、江苏一带则基本未受大的波及。此外，南京还有一套自永乐时代便保留下来的政府机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一旦京师有变，南京迅速发挥作用，稳定时局。崇祯有过南迁的设想没有呢？有的。他的设想为什么没变成现实

呢？那是他担心自己的面子受损。

甲申年正月初三，当人心动荡的北京城还沉浸在节日营造的欢快假象中时，左中允（左中允为管理东宫事务的詹事府属官，正六品，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干部）李明睿被崇祯召到德政殿议事。崇祯问李明睿有没有行之有效的紧急措施应变，李明睿要求崇祯屏去左右，低声提出了放弃京师迁都南京的策略。

崇祯不是没考虑过南迁。得解释一句，所谓南迁，当然也就是事实上的弃城逃跑，但官方的体面说法是南狩，也就是皇帝到南方去打猎。从字面上看，和逃跑没有半点关联。不过，尽管有官方的说法，但崇祯知道再怎么说南迁都不是一件体面的、圣君可以干的事情。他是一个虚荣自负的君主，怎么肯如此狼狈地南迁呢？南迁——逃跑也好，到南方打猎也罢，于他而言，都等于承认他继位十几年来励精图治完全是瞎扯淡。不过在心灵深处，他也明白只有南迁这条路才能延续大明天命。听罢李明睿的意见，崇祯故作姿态地说：“这件事太重大了，还是不要轻易提。”李明睿继续劝说了一番，崇祯这才说出心里话：“我是想这样做，只是无人赞襄，所以推迟到现在。你的意见与朕一样，但外边诸臣不从，怎么办？”接着又说：“这件事情非常重大，你一定要保密，万万不能泄漏出去了，否则我就要重重地办你。”

当天中午，崇祯第二次召见李明睿，似乎想继续研究迁都之策，但李明睿可能以为圣意已决，就没再提此事，崇祯当然不肯先提这没面子的事，也闭口不谈。到了晚上，崇祯终于忍不住，第三次召见李明睿，仔细询问南迁的具体操作细节，李明睿一一